



“泛文化” 社会思潮评论

段平山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韩山师院科研处资助出版

“泛文化”

社会思潮评论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段平山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泛文化”社会思潮评论 / 段平山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360-5375-5

I. 泛… II. 段…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8467 号

责任编辑: 邓裕玲

封面设计: 谭国华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625 1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前言 / 001

第一章 “泛文化”社会思潮的表现特征 / 005

- 一 走进新时代的“文化人” / 005
- 二 文化资源的“民间”化 / 024
- 三 来去匆匆的“文化创新” / 040
- 四 充满活力的“文化研究” / 058

第二章 论“泛文化”时代的理论形象 / 074

- 一 理论的外包装——“合法性”问题 / 074
- 二 社会的和谐以及“和谐理论”问题 / 083
- 三 社会的进步理论与社会的发展理论 / 100
- 四 关于社会学学科理论的建构问题 / 118

第三章 杂而不乱的“市民”社会 / 141

- 一 社会角色的“同化” / 141
- 二 不断进化着的市民形象 / 158
- 三 市民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 180
- 四 从“文化性”到“社会性” / 194

第四章 华而不实的文化消费 / 208

- 一 文化的“圈子”与学术市场 / 208
- 二 走向“调侃”了的鲁迅研究 / 221
- 三 具有“戏说”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 238
- 四 文化的“自慰”与儒学研究 / 260
- 五 “红学”研究中的文化性 / 281

结束语：可能的“文化哲学” / 302

后记 / 306

前 言

界定出“泛文化”社会思潮的确切内涵只能依靠一些比较抽象的描述性语言而不是一些具体的定义性语言，例如：被泛化了的艺术，被支离了的语言，不求甚解的态度，随心所欲的理解，意义含混的现象等等。事实上，“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定义式的，文化的进一步被泛化就是指针对文化的各种意义属性的进一步地被“支离”，使它破碎，使它通过随意的“分布”与“散落”来增加意义属性并扩大意义范围，因而更加使它变得不可定义、不可定性。尽管如此，面对一个泛文化的时代（或者说泛文化的社会），难以界定并不等于是没有可能取得一些比较正确的认识。其实，针对社会与时代的任何形式的“认识”都是与“泛文化”时代的时代精神相悖的，更不用说要彻底地去定性、解析、评论这个时代了。因为并不是人不应该具有追根究底的逻辑思维意识，而是这种不断追问的意识是不利于文化的“繁荣昌盛”的，并且是有碍于文化的“泛化”的。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文化不断地被“泛化”并不断地被“异化”的过程中，任何形式的针对某个文化意义层面以及某个文化现象的“暂停”式的思考都会使人“落伍”或被时代抛弃。

关于“文化”一词的兴盛以及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的“文化热”的确给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领域提供了大量的“可说的话”（包括自我包装、寻找理由和借口、制造概念术语等等）。但是，真正的“泛文化”时代应当是接下来的九十年代之后。之所以要区分这两个不同时期以及“文化热”现象与“泛文化”社会思潮，主要是由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只体现在知识性层面

上,是一种有意识的市场行为,而九十年代的“泛文化”则更体现于社会心理层面上,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会行为。八十年代所泛滥的是“文化”这个概念术语或者说只是些干巴巴的用于修饰的称谓而已(如:“旅游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文化创作”、“文化影视”、“文化绘画”等),而九十年代以来,正当有关“文化”的术语不再被高声叫卖、不再新鲜、不再时髦时,更加丰富多彩、更令人难以把握、更无法进行意义定位的“文化味”、“文化性”等已经牢牢地占据着人们的潜意识。也就是说,“文化”(一词)的泛滥不等于就是“泛文化”的社会思潮。具体来说,第一,理解方式不同。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化”在人们的心目中主要是指知识、视域、学科等等,而九十年代以后人们所理解的“文化”则是指隐匿在各社会现象背后的意识、氛围、价值导向、准则、行规等等。第二,体现方式不同。八十年代之前,人们主要从内容上来界定并区分丰富多样的文化,而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则主要从形式上来营造并指代文化的丰富多样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泛文化”时代的人们都是堂而皇之的以“小意思”自居并以不求甚解的态度、随心所欲的借“词”发挥为正常思维习惯的缘故。第三,认同感不一样。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是一场冲击,是一种贩卖,它往往立足于理解问题、分析问题的着眼点或归结点,所以,并非所有的人都以一种自觉、主动的姿态去认同。而九十年代以来,针对文化的要不要认同、要不要接受的问题已经不存在,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任何人都不得不接受它们或者说已经接受了只不过是“视而不见”罢了,况且对于接受和不接受的原因的理论性反思也似乎是多此一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就是一种“泛文化”的社会思潮。

“泛文化”社会思潮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文化人”与“非文化人”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不清。在八十年代,“有文化的人”与“没有文化的人”是比较分明的,而且也是比较稳定的。但在九十年代及以后,大家都似乎是一些“有文化的人”

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具有了良好的自我感觉，感觉到了“社会意识”以及“文化意识”，也感觉到了“社会的行情”以及“文化的行情”。八十年代还没有“文化人”这个称谓，即便是有人说出来，也好像是一个很没有实际内容的“虚概念”。而在九十年代以后，不仅公开地打出了“文化人”这个身份旗号，而且越来越成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实概念”。然而，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概念的演进，不在于把“有文化的人”改为“文化人”并且把“没有文化的人”改为“非文化人”，而在于“文化人”与“非文化人”之间显得既不明朗也不稳定。换句话说，“文化人”不仅仅只是意味着如今已有了更多的文化制造者与参与者，而是意味着如今的任何一个人已具有了一种能够进行文化参与的潜质。所谓的“文化人”更应当说是一种倾向性、一种意识、一种属性。在当今的社会里，凡是有“形象”的人，凡是有“说法”的人，凡是有“机会”来表达的人，都是些可能的、潜在的“文化人”，在一个各种各样的“相对主义”比较盛行的社会里，“文化人”也是相对的，各不相同的“圈子”里以及各不相同的行业中都有一些各具特色的“文化人”，再加上琳琅满目的文化参与行为使“文化人”不再具有“另类”意义，同时也使“文化人”越来越走向了普遍化与大众化。

从社会角色的扮演这方面来看，能够获取“文化人”这一称谓的人实际上是指一小部分已经拥有了可以表现的机会与可以表现的权力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文化人”是一种感觉，是一个形象特征，而不是一些特定的类属群体。感觉也好，形象也好，它们都是时尚化的，并且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的特点。因为获取话语权力与表现机会的方式是五花八门的，具有个性化和市场化的特点。所以，作为一个“形象”的文化人在泛文化的时代里是一个变量，它不断地进行角色与功能的转换、重组，它的身份特征并不鲜明，它的社会阶层特征也不够明确，由此而来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要从社会心理这一角度出发去认识文化人的共同特征，进而去认识它给“泛文化”社会思潮所带来的影响和作用。

“泛文化”时代里充满了大量的有关文化的“材料”和“产品”，而文化人往往是开发这些“材料”的代表，又是加工、处理这些“材料”的代表，甚至也是文化“产品”的形象代表以及销售代表。这些“材料”在习惯上被所谓的“文化人”以及“专家们”称之为文化资源。就文化资源的开发处理而言，具有民族性特点和历史性特点的“民间”无疑是泛文化社会思潮赖以生存的一个庞大的“后方基地”，虽然针对这个“后方基地”的开发与处理并不存在指令性的程序与原则性，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思潮的稳妥的演进来说，总会有某种潜在的系统性原理，比如说：将文化的生态学原理与创新机制合二为一的“文化研究”，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阐释原则等。由于所有的“研究”与“阐释”都需要消费，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文化心理当中并积极主动地去“触摸”市民大众的消费观念则是当代文化工作的基本工作内容。此外，泛文化社会思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理论的“包装”问题，之所以是理论的“包装”，其原因在于：针对文化的研究与阐释既不是为了证明某个理论，也不是为了发展某个理论，而是为了通过一定的表述把所有的“文化碎片”拉扯在一起，使它们具有某种“关系”。因为文化人不愿意使自己停留在无话可说的“视角主义”层面的，总是想要给出一些很具有包容性和全面性的“说法”。为了追求这些“包容性”和“全面性”，就必然要使所有的“视角”走向“视域化”，也就是在一个“大视角”中引入一个“中视角”，再从“中视角”中设置一个“小视角”，反过来，或者是从某个细微的文化现象中“拷问”出一点（文化的）意义，然后，放置在某种“层面”上，再通过“层面”与“层面”之间的拉扯，获得一个更大的意义“层面”。如此的往返与折腾就是当代理论工作的基本工作方法。

综上所述，“泛文化”社会思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由“文化人”所引领的“文化”工作问题。第二，针对文化现象的理论形象建设问题。第三，市民社会与“文化人”的生存环境问题。第四，学术研究以及文化的消费问题。

第一章 “泛文化”社会思潮的表现特征

一 走进新时代的“文化人”

文化的市场化以及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而且也给人们提供了漫无边际的意义空间。越来越多的人会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角”，或者正在向社会的“主角”迈进，越来越多的人会认为他们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或者至少他们会认为是精神与文化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社会的行情与行规他们已经了解了很多，文化的形式与内容他们也懂得了许多，尽管所谓的“文化程度”与“知识水平”有高有低，但是，它们却并没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好像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懂得了“程度”与“水平”的确切含义。例如，在“文化程度”与“文化水平”里面，究竟暗含了多少的“水分”和多少的“运气”，究竟有多么大的适用范围，又有多么大的市场价值等等。关于这些方面的行情，似乎任何人都不是外行，正如若要畅谈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以及来龙去脉时，人人都可以是不相上下的高手。也正如若要卖弄一番自己的社会见识以及世故经验时，人人都照样是不分高低的能手。虽然“文化”不再神圣、不再神秘，但在那些曾经涉足于文化领域的人看来，如何能够将“文化”的极其丰富的内涵表现出来或者说让它“露”出来使它具有一点“文化性”的特质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能做到这一点，则就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人”了。所以说，“文化人”这个概念要比“文化”这个概念庄严得多，也神圣得多。对于决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们来说，只要有了适当的场合，就可以把别人所认为的具体的“文化事

象”语重心长地重复几句以便置换成玄妙而又抽象的“文化性”。所有的人都可以给自己树立起一种老于世故的形象，所有的人都能够恰当地表现出自己的针对文化性的谦和，正如所有的人都自认为是看破红尘的，但都不至于高傲得不再迫使自己去学习的那样。大家都处在同一个类型的“文化”当中，随时随地触摸着“文化性”的要素，并不知不觉地在做一些具有“文化性”的事。因此，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理直气壮地把自己视为具备了大众化意识和时代特征的“文化人”，既不谦虚也不骄傲，既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入世心态，又能够较好地摆正自己的社会位置。得益于这样的社会主角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文化心理，“文化人”就会顺理成章地产生，并且它的不断性是势不可挡的。

虽然“文化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具有意义的“弹性”和“张力”，也就是它的确切性可伸缩的，它的“场域”是可移动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荣誉，只不过是一种软性的也并不十分神秘的荣誉而已。荣誉是不能毫无节制地进行分配、兜售的，就像“荣誉市民”那样，虽然都不过是一些市民，但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荣誉”，他们就可以代表别人、代言别人。因此，不能让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获得这份“荣誉”，不能让社会上所有的自以为是“文化人”的人成为事实上的“文化人”。按照一种既简单而又古老的传统观念来说，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文化人”，但是，现行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文化”与“知识”不能对应起来，如果把它们对应了起来，那就会影响到“文化性”的魅力与韵味，也会削弱“文化人”这个概念的弹性与张力。况且在当代的普通百姓们看来，“知识”的获取太费力了，以“知识”为依据的定位也太简单、太死板了，只有将“知识”与“文化性”进行一番合理的交配才可以提升“文化人”所应当有的那种“韵味”和“魅力”。“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最好是一种互相“交叉”的关系，其属性是交叉的（简称“性交”），其类型是交叉的（简称“类交”），经过了交叉之后的那些重叠部分就是“文化人”了。这些人可以说是思想

人、精神人、道德人、知识人、形象人、特征人等等，他们可能不是学者，却胜似学者。他们可能没有身份，却能够超越身份。正如“人情味”的副产品“情人味”那样，不是夫妻，却胜似夫妻。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文化人”来取代“知识分子”是完全符合“泛文化”社会思潮的。这个“取代”不但没有得罪知识分子，反而更加激活了知识分子所具备的追求“魅力”与“情调”的“张力结构”。同理，这个“取代”不但没有排挤所谓的非知识分子，反而是增加了他们的追求“荣誉”与“福气”的可能性。因此，时代的“文化人”的出现是光辉灿烂的。

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化本身就具有大众的特征，这种特征来自于中产阶级所固有的简陋的趣味性以及“肥皂剧”式的表演欲。中产阶级热衷于半醉的具有自我感觉的表演，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需要或真的追求平淡无奇，而是为了拉近“文化艺术”与饱食终日的枯燥生活之间的距离，在琐碎的个人问题的小天地里既“栽培”自己的情绪又“移植”别人的情结，并通过这些情结之间的艺术搭配与组合来参与“历史”事件，把握世界与时代的脉搏。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只要能够进行形式与“色调”上的翻新，哪怕是一些纯属二手的材料，也会理所当然地给自己贴上“文化人”或“文化参与者”的标签，登上时尚与潮流的“风口浪尖”。事实上，在“文化参与”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须要抛弃体现在文化与艺术中的固有的主题（有时候这个主题是被设定了的），因为只有挣脱了“主题”的羁绊之后，才能使文化的深刻性演变成所谓的深沉感，才能使思想内容演变成丰富多彩的“小意思”，最终让人的“才气”取代了人的精神，而这正是“文化人”所希望能够看到的。它的好处在于，一是能够安慰自己的低级趣味，二是能够轻松活泼地占有市场，三是能够很好地隐藏起对于成功了的同行的忌妒之心。其实，好处远不止这些，最关键的好处莫过于它不再对社会体制与政治管理构成危险，处在权力阶层和管理阶层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四处漂流、无家可归的文化一旦沾染上了凡俗世界的价值属性，其社会作用力充其量

不过是一个供大家自娱自乐并能够乐在其中的“玩物”而已，各种形式的模仿、摘取、重构、戏说等经过精心的策划与包装，以游戏和搞笑的姿态出场，不仅成就了他们自己（创作者）的舞台，也成就了观看者、评定者们的一个与现实世界相脱离的“第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生活的压力没有了，非官方的组织形式和全民化了的参与方式使人们摆脱了等级、权威、神圣以及逻辑性、观念性等，轻松愉快的感觉舒舒服服地渗透了人体的各个器官部位，最终演变成为一种艺术化了的“性趣”的泛滥，取笑自己的同时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取笑别人，欣赏别人的同时也可以半醉不醒地来欣赏自己。因此，尽管它能够调动起社会上的各种微妙的“性趣”，但正是由于这些趣味是遮遮掩掩的、是共通的、是充满了肉欲和利益的，所以，这种“性趣”除了点缀、装扮、美化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之外，丝毫不会影响到社会的智力结构、游戏规则、解释权与文化资本等。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当然是表面上不闻不问暗地里推波助澜的处在管理阶层的并且拥有了大量的文化资本的人。

如果说当代的文化内容以及当代的文化意义由于得到了毫无目的性的“解构”从而使它的基本性质难以界定的话，那么，由于“文化人”的存在，这些被“解构”了之后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内容则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首先，它能够使所有的针对现实社会的各不相同的理解（不管是精妙的还是平庸的，普遍的还是个别的）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社会认同感。其次，它能够将众多琐碎无聊的“小意思”和“情趣”打造成社会的“素质”品牌来提高“文化人”的被认同感。

传统的命题、古老的词汇、哲学概念、政治术语经过一番技术改造之后，就与所有的低俗、下流语言以及所有的私情、丑闻没有两样，因为它们都只能充当力求娓娓动听、妙趣横生的演说术的奴仆。不管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是否得体，只要能够找到某个合适的场景出现了“得体”的效果，则就是成功人士，也就是个人才，因为他具备了所谓的“素质”。要懂得一点儿五

花八门，知道一点儿社会行情，还要能够了解一点儿“星”像，这就是“素质”的表现方式。在这种“素质”的奴役之下，彼此之间本不存在相互协作的必要性（因为事实上彼此不需要，并且在暗中彼此排挤、彼此仇恨），但是，一定要能够相互交流、相互言说。只要能够找得到合适的场合或者说只要能够合适地创造出一种场合，没有人会阻挡你尽情地言说与尽性地表演，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某个“天才”的信徒，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某个方面的未来的“天才”。这就是社会赋予我们的赖以生存的“素质”与大有可为的“平等”。

当作家、艺术家正在传播他们的趣味和个人生活感受的韵味时，理论家、评论家以及半专业化了的文艺研究人员则不以为然地站在了他们的背后，表面上看很不“协调”，他们不遗余力地并且是挖空心思地指手画脚，但往往是在不经意处“指点江山”，在杯水风波中施展才华，偶尔用一种“退场”之语来表明他们“超凡脱俗”。不过，所谓的“凡俗世界”其实是他们自己预先设计好了的，也是他们经过辛苦的努力故意支离破碎开来的。实际上，他们是在为自己寻求一大堆别样的新鲜话语，以显示所谓的“视角”价值，仅此而已。当人们进入了这些“视角”并习惯于长时间的琢磨与欣赏之后，思想与生活的内容就显得无关紧要了，说话者的姿态与用意也就更是虚无缥缈了。细心而又精明的人沉浸在自己的“感悟”力中，好学进取的人则陶醉在“视角”的艺术美感当中，只有那些性格直爽、有点儿傻瓜气质的人才会发现：原来创作者和评论者是前呼后应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是出于同一个脚本的“舞台搭档”。他们乘坐着同一条“文化”的货船，共同享受着很“文化”的生活。因而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地相互关照，通过翻新了的“才智”以及包装过了的“人气”在快速地浏览思想与理论的趣味性的同时，不断地开发着能够让文化占据整个市场的“经营策略”。按照趣味化的要求、按照感官刺激性的原则，他们将“文化”定位在“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范式中。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由于互相依附，所以，无形当中构造出了一种良性互动关

系。第二，它形成了一种变幻莫测但却始终存在着的文化的“圈子”。有了这个“圈子”，“文化”就能够成为文化人的宠儿，有了这个“宠儿”，荣誉、地位也就会随之而来，当文化人对他们自己的表演技能感到不满或者说再多的表演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表演欲”的时候，“圈子”就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分类了，利益要进行切割，荣誉要进行捐赠。但是，资源要能够共享，优势要能够互补。这样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局面，即文化人的“圈子”就像是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舞台，思想与理论的快速浏览、激情与灵感的切身体验都可以通过机敏的才智装配以及“人气”的包装使他们不断地融为一体，不同版本的文化“趣味”以及不同场合的文化“游戏”又不断地对所谓的“文化生活”进行着“天机不可泄露”式的“归档”与“排位”。因为虽然都是文化生活，但体现出来的“文化性”却有着不同的层次。当“生活”被“文化”限定了以后，“精神的”与“物质的”已经合二为一了，更不用说那些诸如优裕的、贫苦的生活以及高贵的、卑贱的生活了，究竟如何来理解“文化的”玄机呢？

仅仅是热闹吗？不是！为了不使更多的貌似文化人挤进他们的“圈子”，为了坚守学术“阵地”，他们便做起了修筑“桥头堡”的工作，比如“硬”性知识，“学科性”的论断，学术的“规范”等，从而使观念、思想能够来自于某种费心费力的文化“工作”，而不是一时的意识冲动。要让人们知道，思想、意义、价值观念等是“工作”的结果，是文献资料之间的巧妙搭配的结果，而不是出自于某种本能的意识反应。只有这样，才可以坚守“文化”的阵地并维护“文化人”的荣誉价值。论述的模式、思维的格式足以顶得上一张进入买卖学术“合格证”市场的“入场券”，一大堆的考据与广博的外文引证足以说明“合格证”的权威性。如果有人说他是个“文人”，他会认为你的理解太肤浅，不够全面，没有能力认识他；如果有人说他是“学者”，他会认为你的眼光太狭窄，不能很到位地理解他，最好的称谓当然是“文化人”。因为只有“文化人”才可以体现出

其中的奥妙,“文化人”这一称谓真可谓深入浅出,它不至于让别人看透,也不至于让人们定位到底,它有很大的意义的弹性,也有无穷无尽的价值范围。如果说以前的“知识分子”只是用文凭、学究气来点缀说明的话,那么当今的“文化人”则更注重用资历、人气来点缀。要知道,奋力拼搏永远不是走向“文化成就”的充分条件。要让那些自我感觉良好但没有足够的可以言说的“场域”和可以表现的“空间”的人永远觉得惭愧,惭愧的原因不在于没有知识,也不在于不懂得一大堆新名词、学术话语等,而在于没有“利用”文化、组织文化、调配文化的能力。任何一种复杂情绪的流露与发泄都会被视为幼稚,从而遭到刻薄的奚落。也就是说,文化人所处的空间是开放的,但要想进入并获得立足之地真是谈何容易,要不然,“文化人”的工作如何定位呢?因为实质上,文化人所做的工作无非就是竭力维护“文化人”的荣耀与尊贵地位。

在当今的社会里,类似于“孔乙己”式的知识分子已经感觉到了一种身不由己的被“边缘化”,尽管他们晓得自己所得到的待遇是优厚的,但是,若要论及所谓的“文化资本”,他们会深感无奈的,因为能不能够成为社会上的“文化人”,这要看他们能不能够“走俏”以及能不能够散发出一股股具有诱惑力的“人气”。他们晓得,“走俏”与“人气”要比“资本”与“社会位置”更为重要。由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自认为贡献巨大的辛勤的知识分子也会很无奈地落得了一个当代版的“孔乙己”,从而成为当代文化社会中的落伍者。在当今的社会里,所谓的“成功之路”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要“走向成功”却是很不容易的。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真正能够主宰文化潮流与文化时尚的并不是他们的深厚的文化“功底”,更不是通过辛苦所换来的那些“知识的积累”,而是一些“星”光灿烂的表面化了的文化“工作”。甚至可以说,文化的发展并不取决于“深化”与“深刻”,而取决于“泛化”与“肤浅”。况且“成功”的机会不是计算出来的,也是不需要前提与条件的,只要有良好的“时刻

准备着”的心理素质就行。假如能够说得好或者能够长得好，反正只要能够有个“好”处就行。知识的多少无关紧要，付出精力的多少也无足轻重，只要能够具有“影响力”就可以。在很多情况下，虽然明知道是无聊的，但如果无聊得很可爱、无聊得很过瘾，这就有了“走俏”的可能性与“人气”的底蕴。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让自己的身体摆出一个近似于“色相”的姿势，只要是优美的，则就有可能被视为社会上的“文化人”，因为这可以跟“艺术”拉扯上一点关系。再如，让一只动物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获得某项“冠军”，只要能够唤醒人们的某种“兴味”，它就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组成部分。令人发呕的“别致”要比意味深长的“常态”更具有“文化性”，莫名其妙的“搞笑”要比似曾相识的“典雅”具有更好的“文化的”市场价值。所有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任何一个个人的精心设计，因为“文化人”是一个由抽象的社会心理所决定着的普遍概念，是一个由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意识所决定着的集合概念。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广大的市民津津乐道于所谓的“文化人”呢？很具有荣誉感地扮演着“文化人”的角色到底意味着要干什么呢？如果让他们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们并没有充足的勇气，缺乏勇气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当上“文化人”的意图不好意思告诉别人，将他们的走向“文化人”的成功之路公布于众又觉得有失身份，更不用说“成功”的壮丽性与伟大性了。幸好，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心理以及社会行情完全可以通过有意无意的“顺理成章”使他们的“意图”和“身份”能够得到保护。

使文化人引以自豪的并不是他们的“问心无愧”，因为在走向“成功”的金光大道上，根本就不存在苦难与艰辛，更不存在着伟大与壮烈。而仅仅能够聊以自慰的也许就是一连串的来之不易的“幸运”。俗话说：心诚则灵。具备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虽然那些“脱颖而出”的人以及那些“最终胜出”的人也确实付出了很多的精力，甚至是很多

的泪水，但是，这些“精力”和“泪水”只能表明他们具备了很好的心理素质，并不能表明他们具备了优秀的思想和高尚的品质。如果说这些人对于社会已经有所贡献的话，那么，这个“贡献”就表现在他们已经吸引了很多的“文化”的嗅觉灵敏者，就像“腥味”自然能够引来很多的苍蝇臭虫一样，也像“肉渣”能招来大量的蚂蚁蟑螂一样。按照一种较为守旧的观念来说，所谓的“贡献者”是指他对社会生产付出了心血并出了力，然而，当代的人们从不对“生产”感兴趣的，因为所谓的“生产”是那些“农民朋友”和那些“工人兄弟”们所做的是，这些“事”在一般情况下是与“文化人”无关的。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当优厚的社会待遇与不可估量的文化资本也能够促使文化领域中的成功者们在飘飘然心神不定的同时想起一点儿善意的“回报”的行为，于是，他们能够在不经意当中充当并完成可爱的“安琪儿”这一神圣的角色，将习惯上的卖艺与卖身改为献艺与献身。若是文化圈子里面，他们就像是教堂里的合唱赞美诗的歌手，其内容是很庄重的。若是文化圈子外面，他们好像成了诱惑广大市民前来采蜜的“香花”，那些喜欢“艺术性的身体”和“身体性的艺术”的市民们就会“蜂”涌而至，虽然不是贱“卖”，但却是贱“献”，其“献艺”和“献身”的程序是庄重的。不论是在文学界、艺术界，还是演艺界、学术界，都是如此。内容上显得很无聊的语言要用形式上显得很庄重的语气来“奉献”。下流的动作要以很具有艺术感的皮肤与肉体来完成。当包括嘴巴在内的身体的上部已经被看够了的时候，就要很艺术地来“奉献”一下身体的下部。当朴素的感情与明快的思想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奉献”了的时候，就要表露出一一点那些使市民们倍感亲切的“下意识”。不过，这些“下意识”只是是一些蛛丝马迹而已，喜欢推测和想象的人可以尽情地去推测、想象，但推测出来的结果与想象出来的情境已经“失真”了，已经不太“庄重”了，也已经不再很“艺术”了。艺术的东西与美丽的东西往往是不能彻底拥有的，一旦全身心地占有了，就会丧失那种应有的“庄重感”了，好比一旦满足了所有